

知识的本质与德性知识论

——以“原因”关系消解两类认知运气

文 杰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在盖梯尔问题产生以来, 传统的知识界定受到了极大挑战, 形成了“知识的本质”问题。德性知识论相较于其他的知识论进路, 对知识的本质问题有更强的说服力。它将“认知运气”视作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而“辩护”成分与“真理”成分之间的“独立”则是根本原因。笔者认为, “认知运气”主要包括干扰性的和环境性的运气类型。德性论者强调在认知德性与真理二者间建立强的解释性关系, 即“原因”关系, 不仅可以有效地消解两类认知运气, 也可以很好地排除“独立”问题。由此, 我们得到的知识定义是, 知识是产生自理智德性的真信念。

关键词: 知识的本质; 干扰性认知运气; 环境性认知运气; 理智德性 “原因”关系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484/j.cnki.1000-8934.2020.10.006

当谈到“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knowledge)”问题时, 我们很自然地要回溯到《泰阿泰德篇》, “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 简称 JTB) 这一经典的知识定义正是源于该文的讨论, 从此奠定了古典的知识内涵, 并受到西方学界长期的追捧。直至 1963 年, 盖梯尔通过反例的构造严重威胁到传统三元定义之充分必要性。面对盖梯尔反例中涉及的“认知运气(epistemic luck)”问题, 以内在主义(internalism) 和外任主义(externalism) 为代表的知识论进路都各执一策, 以期消解运气问题, 但都未能成功。那么, 我们在“知识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又该何去何从?

自 1980 年索萨(Ernest Sosa) 首次提出“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的概念以来, 德性知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 在近四十年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理智德性概念包含能力德性(ability virtue) 和品质德性(character virtue) 两类, 前者包括视听、记忆、内省等; 后者涉及开放心灵、理智诚实、理智谦逊等。德性知识论主要讨论知识的本质、价值等问题。本文将从德性知识论的角度着重考察知识的本质问题, 主要思路如下: (1) 知识的本质问题与认知运气有关, 更深层地是与知识各要素(辩护要素与真理要素) 之间可能存在“间隙(gap)”或“独立

(independence)”有关; (2) 借助德性知识论者主张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的“原因”关系(“because” relation) 来回应认知运气的反例, 主要包括“干扰性的(intervening)”和“环境性的(environmental)”两种运气类型。

一、知识的本质与认知运气

传统知识论认为, 知识概念应当包含辩护、真、信念这三个要素, 并且它们是充分必要的。而盖梯尔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认为古典定义尚不充分。笔者将盖梯尔案例改写如下:

应聘工作案例

假设 A、B 竞聘同一份工作。A 相信“公文包里有一支钢笔的 B 会得到工作”, A 有两个证据: 面试官向她透露会雇用 B; 她留意到 B 公文包里的钢笔。因此, 她相信“公文包里有一支钢笔的人会得到工作”是真的。但 A 不知道, 公文包里恰有一支钢笔的自己获得了留用机会。

应当说, A 满足古典知识定义, 因为 A 有两个理由辩护信念之真。尽管如此, 我们却很难承认她具有知识。因为, 此处的信念之真当归结于“认知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文杰(1992—), 安徽铜陵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论。

运气”主要是她公文包里一支钢笔的偶然事实导致了偶然为真的结果。另外,盖梯尔的矛头是直指内在主义者的,即便A对其自身所具有的辩护理由是内在可通达的(internally accessible),但由于A对究竟谁将最终留下来以及她自己公文包里是否装有一支钢笔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所以A并不真正拥有知识。同样,外在主义的可靠过程也不能作为知识的充要条件。比如:

田野案例

罗迪是一个农民,他清楚地看到在地里有一个看起来像绵羊的东西,并产生“地里有只绵羊”这一信念,因为地里确实有一只正在吃草的绵羊,所以罗迪的信念是真的。但罗迪看到的是一只看起来像绵羊的毛茸茸的大狗,他根本没有留意到一只绵羊站在那条狗的背后。⁽¹⁾⁷

以古典知识定义观之,罗迪具有一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他具备良好可靠的视觉能力,也持有“地里有只绵羊”的真信念。尽管如此,我们在直觉上仍很难说他具有知识。上述案例告诉我们,信念之真不是由于罗迪的可靠能力及其产生的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而是因为恰有一只绵羊站在毛茸茸的狗的背后这一“运气”。显然,外在主义的进路也难以说明可靠过程的辩护方式是可行的。

总之,内在主义和外任主义都难逃盖梯尔反例之窠臼,似乎都不能保证知识成立的条件是既充分又必要的,因为他们均受到“认知运气”的干扰。

德性知识论者扎格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关于“双重运气(double luck)”的观点清晰地刻画了这一点。我们可借此分析上述两例:在“应聘工作案例”中,A的辩护理由作为“坏运气(bad luck)”往往会得出错误信念“公文包里有一支钢笔的B会得到工作”,而A却最终获得了正确信念——“公文包里有一支钢笔的人会得到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坏运气”被她自己公文包里放着的钢笔和她本人得到了这份工作的“好运气(good luck)”取消。在“田野案例”中,罗迪误把狗当作绵羊的“坏运气”通常会产生错误信念,因为当地里没有羊的时候再持有“地里有只绵羊”的信念就是错的,但这里的“坏运气”被地里恰有一只绵羊的“好运气”取消。在扎格泽博斯基看来,一旦我们掌握了这种“双重运气”的构造机制,就可以大批量地生产反例。她指出构造盖梯尔反例的程序是,我们从一个得到辩护的错误信念开始,这个信念为假是由于某种运气

要素,通过增加另一个运气要素来修改案例,最终使得该信念为真。⁽²⁾²⁸⁸⁻²⁸⁹

应当说,“认知运气”只揭示出盖梯尔问题产生的表面原因,实际上在这一问题背后有更深刻的原因。质言之,对知识来说,辩护与真信念之间必须是密切关联的,但凡两者间出现一定的独立,则JTB对于知识而言就不充分。⁽³⁾⁶⁹即是说,之所以在产生知识的过程中会卷入“认知运气”,是因为辩护成分(更一般地来说,除真理之外的成分)无法保真,它与真理成分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间隙。

综上,知识不等于JTB,内在主义和外任主义在盖梯尔问题上身陷困厄,它们都难以避免“认知运气”的干扰。如果想要进一步探明知识之本质,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应当是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知识进路来消解“认知运气”,排除这里涉及的“独立”问题。

二、“原因”关系与认知运气

德性知识论者在知识的本质和辩护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体来说,他们是如何通过理智德性概念的介入来排除“认知运气”,解决“独立”问题的?首先,为什么德性知识论者会如此青睐“理智德性”概念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为了避免简单可靠论所涉及的奇怪的信念形成过程。例如在经典的“脑损伤案例”中,有一名脑损伤患者雷蒙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变得糊涂不清,但唯独对其脑损伤这一事实具有真信念——“我有一种脑损伤”。

在简单可靠论者看来,因为雷蒙产生信念的过程是稳定可靠的,这种信念形成机制具有保真的特性,所以他具有知识。但是,一方面,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奇怪的过程会带来真信念,产生知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该过程如案例中所描述的那样真实可靠。德性知识论者认为,有必要对可靠过程加以严格限定,以此来调和与常识和直觉上的不一致。师承索萨的另一德性知识论代表——格雷科(John Greco)提出,“关于这种奇怪过程的案例表明简单可靠主义太弱了。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可靠过程都能够产生知识,必须对可靠过程进行限制。而德性理论的考虑可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⁴⁾¹⁵⁰在格雷科看来,要想避免简单可靠论在奇

怪过程方面引起的反直觉,就必须将可靠过程限制在认知者的认知德性基础上,认知德性本身作为能动者的品质构成,不可能是很奇怪的,它具有稳定性。即认知德性是稳定可靠的,不会轻易变化。但反对者可能还是觉得雷蒙的认知能力是可靠的(尽管不同于常人),因为在模态考虑中,雷蒙在几乎所有邻近的可能世界(close possible worlds)中都能可靠地产生出正确的认知信念。对此,格雷科提出“认知整合(cognitive integration)”的观点予以回应,即是说,在信念系统中认知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产生功能作用的。⁽⁴⁾¹⁵²雷蒙奇怪的认知能力与他认知的其他方面不能很好地整合,孤立的能力产生单个的信念,无关于其他信念的形成和评价,所以并不稳定。

其次,是否具备理智德性、真和信念三个要素就拥有了知识的充要条件呢?显然还不够,在“田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罗迪得到了“地里有只绵羊”的真信念,也具有理智德性,即可靠的视觉能力。但是,结果仍不能视其拥有知识。也就是说,如果仅从辩护概念转到理智德性概念上仍然难逃“独立”问题。所以,隐含在德性进路知识定义中的“原因”关系才是对古典知识定义最根本意义上的超越。德性知识论者对知识的基本界定是:知识是产生自理智德性的真信念。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定义中隐含着的“原因”关系呢?

在索萨的AAA定义中,三A是指精确性(accuracy)、熟练性(adroitness)和适切性(aptness)。在行动表现方面,以弓箭手打靶为例,这三个层面依次指向:射中靶心;展现射箭技能;因自身熟巧的技术打中靶子。而在信念评价方面,这三个维度又体现为:信念之真;理智德性的发挥;运用理智德性获得真信念。⁽⁵⁾²²⁻²³比如,收银员小王业务水平高,绝大多数情况下,她凭借其熟巧的计算能力都能把账目算清,但有时候,她之所以没算错账,并不是能力所致,而是靠猜的。应当说,认知能力而非认知运气(如猜测)是形成知识的主要因素。在索萨看来,适切的信念才是知识,即知识是产生自理智德性的真信念。显然,索萨强调这里有一种“原因”关系(its being true because competent),理智德性是“因”,真信念是“果”,由前者导向后者即为知识。索萨之所以要强调理智德性与真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为了解决扎格泽博斯基所指出的“独立”问题,尽管包括索萨在内的德性可靠

论者都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在索萨那里,只是一般性地强调了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要有因果解释关系的话,则我们可以认为,格雷科关于KSA理论的分析具体展现了“原因”关系需要满足的条件,从而使得我们对“原因”关系的理论蕴涵理解得更为通透。格雷科的KSA理论指的是,Knowledge is success (epistemic success) from ability。他对KSA的定义是“S知道p,当且仅当S相信真理(关于p)是因为S的信念p是通过理智能力而产生的。”⁽⁴⁾⁷¹在这里,“原因”关系再次呈现出来,强调理智能力与真信念之间的因果解释关系。而格雷科的“功劳理论(credit theory)”更进一步阐明了这层关系的内核。简单来说,归因(attribution)的意思是,认知者S之所以相信p,是因其自身理智能力的发挥,这一点对于解释为什么S相信p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在所有因果解释中是占据第一位的。⁽⁶⁾²⁷⁴由此可得,“原因”关系应当满足这样两个条件:条件一,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应建立因果解释关系;条件二,理智德性必须占据最重要的解释地位。不难理解,在知识形成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因素,各解释因素的解釋力不一,而只有当认知能力成为最突显的解释因素时才会产生知识。比如,一场龙舟比赛中,拔得头筹的因素有很多(风向合适、水面平静、配合默契等),但我们很难否认冠军队队员的熟练技巧才是致胜关键。总之,我们不否认信念形成过程中存在诸多解释因素,它们也各有其解释作用或解释力,但它们相较于认知德性所具备的解释地位则是次要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面对盖梯尔类型的反例时,我们通过“原因”关系是如何能够消解“认知运气”的。以“田野案例”为例,罗迪的信念之所以是真的,并不是他直接在视觉中捕捉到了地里有羊的信息,实际上他对此毫不知情,即他的认知能力不能保真,只是偶然的事实“一只绵羊恰巧站在似羊的大狗后面”塑造了真。也就是说,罗迪的信念为真只不过是好运的降临,并不是其认知能力的作用。在罗迪的可靠视力与真信念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因果联系,其认知能力不能作为场景中最突出的解释因素。

总的来说,隐含在德性进路中的“原因”关系,即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才是对古典知识定义最根本意义上的超越。应当说,索萨的

AAA结构和格雷科的KSA理论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他们都认为,知识的界定需要介入“原因”关系;另一方面,格雷科对“原因”关系的讨论相比索萨则显得更为具体、通透。笔者总结出“原因”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条件一,理智德性是导致信念成真的解释性因素;条件二,它在所有解释因素中也是最具解释力的。

三、如何消解两类认知运气

由上文可见,德性知识论以“原因”关系来消解认知运气的做法是富有理论洞见的,它在解释诸如“田野案例”类型的盖梯尔反例方面具有理论优势。但是,反对者试图构造另一类认知运气的反例来质疑德性知识论者的想法。在笔者看来,这些反驳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通过对这些反驳的进一步澄清来捍卫上述“原因”关系的考虑。反例如下:

假谷仓案例

巴尼驾车正行驶在乡间,他朝车外望去,看到一个谷仓后相信“这里有一个谷仓”,实际上这一信念是真的。但巴尼并不知晓他正身处“假谷仓县”,到处都是假谷仓,即便那看起来与真的并无不同。假若巴尼看到的是一个假谷仓,他也不会知道那是假的。然而,凑巧的是,巴尼正好碰到一个真谷仓。⁽¹⁾⁸

从直觉上看,我们会认为案例中的巴尼缺乏知识,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此环境下很容易出错。但是,如果以德性知识论者的“原因”关系来分析的话,我们便会认为他具有知识。因为,巴尼正常的视觉能力是解释信念“这里有一个谷仓”为真的最突出因素。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得出了矛盾的结果:巴尼既具有知识又没有知识。

在我们正式考察这种矛盾结果之前,让我们预先说明一下,“田野案例”与“假谷仓案例”所涉及的认知运气有何区别。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指出:在“田野案例”中,罗迪拥有真信念,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地里有只羊,运气阻碍、干扰了他的信念与实在对象匹配一致,此类运气被叫作“干扰性认知运气”;而在“假谷仓案例”中,并无干扰成分,这里的运气更多的是指他周遭的认知环境是欺骗性的、不友好的,这种环境极易造成能动者陷入认知错乱,这就是所谓的“环境性认知运气”。⁽⁷⁾³⁶简

言之,“干扰性认知运气”的干扰机制作用于认知者与目标事实之间;而“环境性认知运气”是指认知者处于一个认知上具有很强迷惑性的、不友好的环境之中,处于该认知情境中很容易出现认知谬误。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强调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的“原因”关系可以排除“干扰性认知运气”,可以弥合能动者与目标事实之间的断裂。这一点在解析“田野案例”时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在罗迪的视力与所视之物之间寻求建立“原因”关系,若不符合则不能说罗迪具有知识。而在“假谷仓案例”中,巴尼的视力与谷仓之间具有强的解释性关系,满足“原因”关系,但是巴尼却没有知识。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么德性论者关于“原因”关系的论述需要更充分、更详实的说明,以期有力地回应“环境性认知运气”的反例;要么就是去否定“环境性认知运气”这类反例的合法性。接下来,我们将从后者出发。

笔者认为,“假谷仓案例”可以用“能力”是语境敏感的(context-sensitivity)观点来进行回应。假如某人具备打乒乓球的技能,这仅仅意味着他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打好球,而绝不是说他蒙上眼睛或换只手也能玩。如果说S有能力a是指,S可以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境中自如地运用a,那将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必须否认有这样一种能力a的存在。“可靠论者像索萨经常提到,特定的能力德性在某些环境里可靠,而在另一些环境中不可靠……如果我们说一能力是可靠的,只是说在这些相关环境条件允许或不阻碍,或不干预功能发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⁸⁾⁶⁴也就是说,我们可靠的能力只有在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下才是可靠的。

在“假谷仓案例”中,笔者认为存在两种认知能力,一种是普通的识别谷仓与非谷仓(如:帐篷、蒙古包等)的能力A,另一种是辨别真谷仓与假谷仓(极其像真的谷仓)之间差异的特殊能力B。批评者认为,按照德性知识论者的观点,A与p(p指“这里有一个谷仓”这个真信念)之间具有“原因”关系,因而认知者S具有知识,但直觉上我们不认为S具有知识,这就出现矛盾了。在笔者看来,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批评者不应该在A与p之间建立“原因”关系,而应该是在B与p之间建立“原因”关系,因为S不具有B,因而S不具有知识,这是符合直觉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在B与p,而不是A与p之间建立“原因”关系呢?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批评者为什么认为巴尼没有知识?因为,他在邻近可能世界中极易出错,在那些世界中,他没有认识到他在一个假谷仓县,他不具备能力B。显然,我们之所以说巴尼在可能世界中不具有知识,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假谷仓却仍然说“这里有一个谷仓”。同样地,在现实世界中,他也不具备能力B。总之,在假谷仓县如果不具备这种特殊的能力B,是不可能认识到真的谷仓的。换言之,如果巴尼不能摆脱充满运气的环境,是不可能产生知识的。而批评者把A与p之间建立“原因”关系的观点强加到德性知识论者身上,这是“欲加之罪”。我们知道,在假谷仓县,能动者必须具备能力B,才有可能获得知识。德性知识论者对“能力”的语境敏感性的强调恰能说明这里的问题,我们只有以能力B与p之间是否建立了“原因”关系才能判定巴尼是否具有知识。因为巴尼并不具备这种能力B,所以没有知识,这符合最初的直觉。因而,此反例并不对“原因”关系构成挑战。

接着,笔者将通过回应普理查德对上述方案的两点反驳,进一步证明上述方案的合理性。

反驳一:尽管我们通常会根据环境对能力进行相对化处理,但我们不会做很细致的限定,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这样做。比如,弹钢琴的能力不仅仅是指室外可以弹,也包括室内可以弹,哪怕有噪音也可以弹等等。类似地,巴尼在案例中所运用的能力就是普通的认知能力,即在良好的认知条件下,较近的范围内,辨识差不多大小的谷仓。⁽⁹⁾²⁶⁸

回应一:这个反驳将弹钢琴的能力与普通的识别谷仓的能力作对比,将二者视为同种类型,都看作是普通的能力,即未经明确限定的能力。显然,普理查德的这种看法是成问题的。因为在弹钢琴的例子中,所处的环境都是与这种能力直接相关的,室内、室外、噪音等等因素并不会严重干扰弹奏能力的正常发挥。相反,在假谷仓案例中,所处的环境很可能会影响能力A的发挥。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有理由非常具体地限定一种识别真假谷仓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所得到的“这里有一个谷仓”的认知结果就会始终是运气地、偶然地为真。因此,上述反驳没有说服力。

反驳二:在“假谷仓案例”中我们不需要对能力进行相对化的处理。例如,我们假定能动者C在水下弹钢琴,实际上不是,但她并不知道。很有可能C是在一个被水包围着的房间。直觉上,我们会认

为,C在这种情境中展现的弹奏能力与通常是一样的。应当说,这个例子其实与“假谷仓案例”中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尽管巴尼很容易就会遇到一个假谷仓,但实际上没有,这就像C很可能在水下弹琴,但实际上不是。因此,正如C在水下房间里展现出来的是普通的弹奏能力,巴尼所呈现出的也是普通的识别谷仓的能力。⁽⁹⁾²⁶⁸

回应二:这里的反驳颇具诱惑力,我们很容易相信在水下房间里展现的普通弹奏能力与在假谷仓县普通的识别谷仓的能力相似。但笔者对这种“相似性”表示怀疑:第一,在水下钢琴的例子中,我们认为C在房间里弹钢琴在行动上成功的,是一种成就(achievement),而巴尼尽管在认知上是成功的,但却不是一种成就,没有获得知识。第二,从可能世界的角度来看,只有在遥远的可能世界中,C才会在真实的水下弹钢琴;而巴尼在邻近的可能世界中就会遇到假谷仓。实际上,我们会说,巴尼本身就是在在一个不友好的认知环境下,而C本身是处在行动上友好的环境中。因此,反驳二并不奏效。

总之,普理查德在两个反驳中是要强调,“假谷仓案例”中巴尼在得到“这里有一个谷仓”的真信念时运用的是普通的识别谷仓的能力(即能力A),“原因”关系很难一以贯之。笔者认为,在假谷仓县这样一种不友好的环境中,我们有理由对巴尼的认知能力做一种很具体的限定,即识别真假谷仓的能力B。因为,我们的认知者若没有能力B,他就不可能获得不受运气影响的结果,即便是真信念,也只是认知上的成功而非成就。所以,我们应该在B与p,而不是A与p之间建立“原因”关系,B与p之间是否建立了“原因”关系才是判定巴尼是否具有知识的关键。一言以蔽之,“假谷仓案例”可以用“能力”是语境敏感的观点来进行回应,“环境性认知运气”类型的反例对“原因”关系的拒斥是不合法的。

结 语

本文的讨论主要是以德性知识论的视角来考察知识的本质问题。德性知识论者主张从辩护者出发,关注辩护者的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的“原因”关系,他们在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建立强的解释性关系,以消除“独立”问题,取消认知运气的干扰。德性论者以“原因”关系消解和回应“运气”

问题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干扰性认知运气”的产生是由于理智德性与真信念之间没有建立“原因”关系,理智德性不具有突出的解释力;而“环境性认知运气”的产生是由于批评者没有认识到,在认知上不友好的环境中,必须以特殊的认知能力与真信念之间是否建立了“原因”关系来判定能动者是否具有知识。因此,我们进一步捍卫了知识是产生自理智德性的真信念这一定义。

参考文献

- (1) Duncan Pritchard. *Epistemolog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2) Linda Zagzebski. *Virtues of the Min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Virtue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Linda Zagzebski. The Inescapability of Gettier Problems [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4, 44(174): 65–73.
- (4) John Greco. *Achieving Knowledge: A Virtue – Theoretic Account of Epistemic Normativ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5) Ernest Sosa. *A Virtue Epistemology: Apt Belief and Reflective Belief, volume 1*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John Greco. Knowledge as Credit for True Belief [C] // John Greco, John Turri. (ed.) *Virtue Epistem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2.
- (7) Duncan Pritchard, Alan Millar, Adrian Haddock.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Knowledge: Three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8) Jason Baehr. *The Inquiring Mind: On Intellectual Virtues and Virtue Epistemolog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9) Duncan Pritchard. Anti – Luck Virtue Epistemology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2, 109(3): 247–279.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Virtue Epistemology: Eliminating the Two Kinds of Epistemic Luck by the “Because” Relation

WEN Ji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41 ,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Gettier’s problem has proposed,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has been challenged in some significant degree, and forme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problem. Compared to other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 virtue epistemology has a more stronger persuasion on the nature problem. It regards “epistemic luck” 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problem, while the “gap” between justification and true belief is the primary cause. I point out that “epistemic luck” mainly included two kinds of intervening and environmental. Virtue theorists stressed on that it should build a robust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epistemic virtue and truth— “because” rel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validly eliminate the two types of epistemic luck, but also appropriately solve the “independence” problem. In conclusion, we get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as a true belief arises from intellectual virtues.

Key word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tervening epistemic luck; environmental epistemic luck; intellectual virtues; “because” relation

(本文责任编辑: 费多益)